

论符号修辞四体演进的共时性

王立慧

摘要：四体演进规律是衡量社会发展或历史演变的。无论是维柯、弗莱、卡尔·曼海姆还是中国传统文学，都在各自的论述中都按照历时性的规律对四体演进进行阐释和解释。然而笔者在回顾了人类商品交换发展阶段、“霸权”的动态更迭和人类传播历史的发展后认为，在看待四体演进规律的时候，不仅仅要采用历时的角度，更需要结合共时的角度，才能完整呈现事物本身的状态。这种共时性，是历时形成的，是动态演变的，也就是说，四体演进也是一种共时性理论。

关键词：四体演进 历时性 共时性 历史发展

DOI:10.13760/b.cnki.csalt.2017.0006

一、四体演进：一种历时角度

符号修辞的四个主要修辞格——隐喻、转喻、提喻、反讽之间有一种递进的否定关系，各种修辞格都相互否定，同时反讽是对所有修辞格的总否定。从隐喻到反讽构成了四体演进，即隐喻（异之同）—转喻（同之异）—提喻（分之合）—反讽（合之分）。^①

詹姆逊和卡勒认为修辞四格推进是“历史规律”，是人类文化大规模的“概念基型”。^②四体演进的概念最先是由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在18世纪初的启蒙时代提出的。维柯把世界历史的退化过程分成了四个阶段，分别是“神祇时期”“英雄时期”“人的时期”“颓废时期”，以上四个时期之所以称为“历史的退化过程”，是因为历史崇高感的消失。这四个时期分别与比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相对应，四体演进由此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或历史演变的规律。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维柯之外，弗莱和曼海姆也分别在论著中提出了四体演进。弗莱 1957 年在《批评的解剖》中将欧洲文学主人公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神话或神的故事，主人公在性质上超越凡人及凡人生活的环境，这种故事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通常并不列入规定的文学类型；

第二阶段：传说、民间故事、童话，主人公是传奇式的典型人物，出类拔萃且具有超凡勇气和忍耐；

第三阶段：“高模仿”类型的主人公，这类主人公多存在于史诗和悲剧中，他们具有的权威与激情超过凡人，但同时又要遵守社会制约和自然规律，他们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那种主人公类型；

第四阶段：“低模仿”类型的主人公，这类主人公常见于喜剧和现实主义小说中，这个阶段中的主人公，便是我们中的一员。

第五阶段：“讽刺”类型的主人公，他们的体力与智力都比我们低劣，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荒唐的遭遇和可笑的行为。^①

弗莱在回顾了上述五个阶段后指出：“我们会明白，一千五百年以来，欧洲虚构文学的重心不断按照上面的顺序向下移动。”^② 根据弗莱的文学分期推进说，除去不列入文学规定的第一阶段外，其他四个阶段与四体演进的隐喻性、转喻性、提喻性、反讽性相吻合。

早在弗莱之前，卡尔·曼海姆 1929 年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四种世界观的演进：隐喻式的无政府主义，转喻式的保守主义，提喻式的激进主义，反讽式的自由主义。这四者都承认社会改造的必要性，但是代表着对时间的四种不同取向：过去、现在、未来、虚化未来。^③

中国文化中的四体演进规律也非常普遍。赵毅衡教授认为由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组成的中国传统文学是一种隐喻，因为“各单元之间是情节片段式的，是同一隐喻项（阴阳之道）的反复”^④；发生在五四时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是一种强调连接性的转喻；20 世纪 30 年代后现实主义文学兴起，强调“为人生”，强调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种提喻性的文学；“八五新潮”引发的“先锋文学”恪守不断创新的原则，打破了被广泛认可的规范和传统，创造各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大胆引进曾经被忽略的和遭到禁忌的题材，形成一种反讽的局面。

四体演进的原因究竟何在？赵毅衡教授指出：“任何一种表意方式，不可

①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45 页—47 页。

② 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47 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18 页。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20 页。

避免走向自身的否定。”^①也就是说，随着自身的发展成熟，文化最终会走向自我解构。“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物极必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四体演进：共时性立场的提出

作为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最早引进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把这种概念用于研究文化对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说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并不仅仅依赖经济力量和物质力量，更多的是凝结为文化上的霸权主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带有浓厚的文化主体性，这一点刚好符合威廉斯的文化理论。

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culture is the whole way of life），这种观念的文化不再是被动地服从的消极力量，而是在社会建构中处于积极主动地位的，并发挥建设性作用。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文化”在18世纪以前指对农作物的培育和对牲畜的驯化，从卢梭开始“文化”具备拥有取代性意义的基础，这个取代性意义就是：“文化”是一种与外在发展迥然有别的、“内在”的或“精神”的过程。^②在此基础之上，文化的概念被扩展，文化不仅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根源，同时也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政治方式、新的社会关系等的反映。威廉斯始终强调文化与社会、经济、政治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

威廉斯把文化的动态过程作为霸权理论的核心部分。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这样表述：

霸权是一种实际体验到的意义、价值体系，当这些意义、价值作为实践被人们体验式常常表现出彼此相互确证的情况。这样，霸权就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构建起一种社会现实感，一种绝对的意义——因为一旦超出经验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其生活的大多数领域内便难以行动。这也就是说，霸权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又不能不总被看作是那种实际体验到的，特定阶级的主导和从属。^③

威廉斯进一步提出了文化的三种模式来进一步阐述霸权的动态过程，这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0页。

②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③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三种文化分别为“主导文化”(the dominant)、“残余文化”(the residual)和“新兴文化”(the emergent)。

主导文化是在特定社会时期占据霸权的主流文化，因此主导文化绝不是静态的、不变的文化，而是一直处于运动和变化中的文化。主导文化用于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它在任何社会都是核心系统。“残余”不同于“古旧”，威廉斯指出，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来自过去的合理因素。确切地说，“残余”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却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事物。^① 残余文化不仅仅是过去的某些因素，它们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一般来说，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之间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主导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不允许有太多的残余文化在主导文化自身之外存在，否则会对主导文化本身产生威胁。因此，主导文化会“收编”(incorporate)残余文化的某些部分。比如封建文化是残余的，但是其中的某些价值(比如孝道)可以被现代社会收编；道家“无为”的思想与现代社会也存在对立，也是残余，但是其“天人合一”的理念可以被现代社会收编。但是主导文化对残余文化的收编不是完全的，那种能够消解主导文化，被主导文化所压制的部分仍然是受抵制的。

“新兴文化”(the emergent)是指“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新的实践、新的关系及关系类型”^②，新的阶级和被排斥的社会领域构成了“新兴文化”的两个来源。威廉斯也指出，新兴文化一旦出现，主导文化就开始了对其的收编。威廉斯用工人阶级作品的兴起与被收编的过程对“新兴文化”的观点加以论证。新兴文化是与新的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新的阶级与统治阶级对立，故主导文化对其的收编也是暂时的。从长远角度来看，新的阶级势必会同原有的统治阶级产生分歧与对抗，新兴文化势必会颠覆原有的主导文化使其成为残余文化，使自身成为新的主导文化。

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收编与反收编的斗争对霸权起着消解和更新的作用，这是霸权争夺的动态过程。这种过程与其说是历时的，不如说是由历时形成的动态共时。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霸权的更迭、社会新的阶级的崛起与胜利，都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下完成的，三种文化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

前文中赵毅衡教授指出的中国文化的四体演进——隐喻性的中国传统文

^①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② 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2页。

学、转喻性的五四文学、提喻性的三十年代文学、反讽的先锋文学，在笔者看来，也是一种共时性存在，只是在不同时期，在特定的阶段，某一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同样的，无论维柯提出的罗曼史的隐喻性、悲剧的转喻性、喜剧的提喻性，还是反讽，也都是一种由历时形成的共时关系，它们不是彼此取代，而是某种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文化处于从属地位。所以说，曼海姆的四种世界观的演进也是一种共时的存在。

三、四体演进：从历时到共时

上文中提到，无论是维柯、弗莱、卡尔·曼海姆，还是中国传统文学，都按照历时性的规律对四体演进进行阐释和解释。赵毅衡教授在2012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第九章“符号修辞”中提到四体演进规律时，也是从历时性的发展角度而言的。然而笔者在回顾了人类商品交换发展阶段和人类传播历史的发展后认为，在运用四体演进规律的时候，不仅仅需要历时的角度，更需要结合共时的角度，才能完整呈现事物本身状态。这种共时性，是历时形成的，是动态演变的，也就是说，四体演进也是一种共时性理论。

（一）人类商品交换发展阶段的共时性

“商品，本质上是一种交换符号。”^① 马克思指出，人类商品交换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这是对人类社会商品交换发展的普遍认识。笔者认为，当代社会，更倾向于鲍德里亚所描述的“符号消费”时代。原始物物交换时代、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符号消费时代，构成了人类商品交换发展的四体演进。

1. 隐喻性的原始物物交换时代

物物交换是人类最初的交换形式，是商品交换的最直接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边界上，在它和其他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出现的。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由此浸入公社内部，对它起着瓦解作用。因而，在不同公社间的物物交换中变成商品的那些特殊使用价值，如奴隶、牲畜、

^① 陈文斌：《为什么马克思提出“商品是一种符号”？》，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1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金属，通常成为公社本身内部的最早的货币。”^① 物物交换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情节再现 (episodic representation)，该交换时代最大的局限在于一对一的供求关系，它给商品交换带来极大的不便，限制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最初的、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被马克思看成是人类商品交换的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具有修辞上的隐喻性。

2. 转喻性的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

随着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交换次数的增加，许多不同用途和目的的产品在数量上大幅增加，积极进入交换过程，瓦解了物物交换的形式。此时为了方便交换，就需要第三方来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作为第三方的商品，可以成为所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商品交换过程以物物交换的直接形式转变为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形式。

在人类历史上，贝壳、米、家畜、木材等都在不同时期扮演过第三方的角色。然而这种实物货币存在很多缺点，如不方便携带、不易分割、质量不恒定且不易保存。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实物货币必然会被金属货币取代。货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商品交换的重大革命。货币解决了在原始物物交换时代出现的难题，使得交换冲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制约，让商品交换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它增进了经济的横向联系，也使交换的时空范畴进一步扩展，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可以看成是转喻性的，即寻找外在于商品本身的某种交换物，以此达到商品交换的目的。

3. 提喻性的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上述两种商品的交换都是由生产者作为商品交易的双方而进行的。商品交换的范围和规模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断扩大，商品生产活动和交换活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对矛盾，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应运而生，这类人被称为商人，他们专门针对商品交换的需要进行相应的活动。至此，商品交换的形式较之以往表现出复杂的一面。

商人资本是商品资本职能的独立化形态，商人的出现使货币具有了资本的属性，商人在商品的流通领域中专门从事商品销售，以获取商业利润为最终目的。商人的出现，有利于加速商品的流转，能够有效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再次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规模和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

以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时代是提喻性时代，资本主义是其社会现实，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40页。

这个现实需要“商业”来提示整个社会，从而强调社会被“商业”所联系。

4. 反讽性质的符号消费时代

“正如符号学的能指凌驾于所指之上一样，商品关系中的交换价值也最终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①在鲍德里亚看来，产品过剩的消费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过剩，意味着人类从原有的商品拜物教时代进入被符号所控制的符号消费时代，现代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符号的控制与支配。

基于符号控制的新符号消费对传统的社会伦理和风俗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此前传统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主要是对物在使用功能意义上的消费的话，那么符号消费就是对马克思·韦伯所崇尚的清教伦理的一种颠覆。依照传统观念，生产、积累和消费三者之间的顺序是不曾改变的，消费总是在生产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进行的。然而按照符号消费的观念，生产力的提高导致产品绝对过剩，在产品绝对过剩的时代，消费的已经不再是产品本身，而更多是附加在产品上的其他因素。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为鼓励消费实施了消费贷款和信用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过度消费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尺。创造欲望，消费狂欢，是消费社会下的新的道德观念，象征着消费社会的历史性讽刺。

回顾商品交换发展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商品的交换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分工从简单的初级形式一步步走向复杂的高级形式的。在原始社会末期，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导致了剩余产品的出现，部落之间和少数的个人之间产生了直接的物物交换，以满足部落和个人的生存之需。严格地说，这些交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因为这只是少量的剩余产品的交换，生产的目的也不是交换，交换只是部落或个人在消费不了自己的产品时进行的一种活动。

原始社会瓦解后，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由于使用了铁器等劳动工具，人类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开始出现大量剩余，私有制由此产生。大量的私有剩余产品被投入产品交换过程，这个过程当中的剩余产品就具有了商品属性。随着剩余产品交换的不断扩大，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出现了，人类社会也进入商品生产阶段。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是出现于商品交换之后的。

随着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金银充当了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并且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这种人被称为商人。此时第三

^① 李军学：《消费社会和符码统治：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性研究》，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8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次人类社会大分工发生了,专门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具有了增值货币的属性,也就是具有了商人资本属性。

随着专门从事商品交换人数的增加,商品交换成为一种特殊的工作,这个“特殊工作”,被称为“商业”。

商业史学家研究发现,早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人,只是这些人是零散的、不成规模的。商业的诞生则解决了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之间存在的矛盾。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商业从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商品生产者摆脱了大部分的交换事务,也不能说明商业交换完全代替了生产者的交换职能,因为在商业独立后,仍有部分交易是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发生的,即便在商业更发达的今天,仍然存在商品的直接交换,比如企业直销。

人类商品交换阶段的发展过程表明,历时的四体演进最终共时性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人类无法避免地在同一阶段同时运用几种商品交换形式。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不仅商品交换是共时存在的,文化主导权亦是。

(二) 媒介发展的共时性

文化主导权在社会中最直接的呈现方式就是媒介。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波兹曼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写道:“媒介的形势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①也就是说媒介对于某一时期文化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作用。

我们可以把迄今为止的人类传播活动按照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分为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四个阶段。这个历史进程中,各种媒介并不是简单叠加,而是历时出现、共时推进。

口语传播归功于人类的劳动。长期的劳动促进了人体大脑的发育和思维能力的产生,形成了口语传播的生理条件。口语传播大大加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到今天为止,口语仍然是最基本、最普遍、最灵活的交流方式。口语传播的简单性和直接性是一种隐喻,此隐喻指向了人类传播的最初形式。

作为人类最初传播阶段的口语传播有着局限性。首先,口语只能在近距离内交流和传播;其次,口语传播转瞬即逝,记录性较差,它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靠人类大脑的记忆能力。所以说,时间和空间是对口语传播最大的限制,口语传播只能被应用于近距离的社会群体传播和小范围内的信息传输,当社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简单的口语传播便再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

^①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人类发展历史上第二座重要的里程碑就是文字的发明。如果说上文谈到的口语的产生与传播使人类摆脱了原始动物的状态,那么文字的出现就转喻式地标志着人类进入更高阶段的文明。文字基于结绳符号和原始图画而被创造,人类传播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由于文字的产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印刷时代是以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为基础的,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直到15世纪40年代,德国工匠古腾堡在中国活字印刷和油墨技术的基础上创造了金属活字排版,至此文字信息得以机械生产和大量复制,信息的传播速度较之以往有了明显加快。印刷机的出现直接催生了近代报业。伴随着知识的普及和民众读写能力的提高,印刷媒介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多社会变革往往都是依靠印刷媒介进行宣传的。印刷媒介提取了18、19世纪人类社会的生活片段,在今天看来,那种提喻代表了“昔日的美好时光”(the good old days)。

如果说口语传播使人类具备了基本的传播条件,文字的发明突破了传播的时空限制,印刷媒介实现了文字信息的批量生产和复制,那么电子信息技术就实现了信息传播的瞬时性,以时间换空间,时间上的瞬时性带给人类空间上的临近感,同时电子信息技术使大量信息得以保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电子通信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人类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里,信息的重要程度与物质和能源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比二者更加重要而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核心动力。信息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依托电子技术的新媒介的产生,让地球变为一个小小的“村落”,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与此同时,新媒介也引发了“信息爆炸”,海量的信息垃圾充斥着现代人类的生活,公众在传播过程中的角色从单一的受传者变成了传播者和受传者兼具。媒介的这种变化和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和文化的影响也已经日益凸显,这种凸显也成为一种讽刺,讽刺了人类思维的碎片化与片段化,讽刺了当媒介真的成为人体延伸后,人类对媒介的依赖与媒介技术对人类的奴役。

从媒介技术发展来说,每当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出现,人们都会认为它会完全取代旧的、已有的媒介技术。比方说十年前就有专家断言,互联网的出现会终结纸质书籍。但时至今日,从目前图书市场的现状来说,纸质书籍非但没有被互联网完全取代,反而开始恢复生机,2014年全国实体书店图书零售市场同比增长率达3.26%,结束了2013、2012年连续两年的负增长,人们似乎更愿意挣脱互联网技术而回归朴素的阅读。

口语、文字、印刷、电子，人类传播发展的四个阶段，历时地出现，共时地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从单一到多元化的媒介，每天都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结语：四体演进，共时之后，走向何方？

任何符号表意都逃不出四体演进的历史规律。四体演进的尽头是反讽，反讽之后，又将如何？赵毅衡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两点：

第一种方式是重新开始另一种表意方式，重新构成一个从隐喻到反讽的历史演变；第二种方式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反讽”状态。

笔者认为，赵毅衡教授“狡猾”地用这两种方式对所有符号表意按规律演变之后的状况作了总结。然而笔者认为，在这两条路径之外的新的表意方式没有穷尽，用反讽结束自身的，多半是以新替旧，是一种革命式的改变。而坚持“反讽主义”的哲学家罗蒂则认为反讽才是现代社会最合适的状态，但是要达到这个状态很难，因此笔者认为还存在第三种方式——共存。上文提到，无论以新替旧的重新开始还是漫长的反讽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都难以到达。以新替旧的重新开始涉及推翻既存的所有符号文本表意方式；漫长的反讽状态则需要社会性交流达成共识。在未达到以上两种局面之前，符号文本表意更多处于一种四体共时的状态，人类社会的四种商品交换方式共时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不同媒介更是共时地存在于人类社会。

回顾历史也会发现，历史上所有的符号表意方式的演变总是遵循这三条路线，无论是朝代的更替、文化的发展还是传播的变化，无一例外。笔者认为这三条路线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三条路线不可能并存于人类社会，路线的选择取决于人类的表意方式，哪一种表意方式更能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人类就会选择它。

作者简介：

王立慧，四川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四川艺术学院戏剧系讲师，主要从事传播学、符号学研究。